

溯源甘肃

木简无言 史韵悠长

——甘肃秦汉简牍概况

本报特约撰稿人 常燕娜

甘肃是我国简牍出土大省之一,因河西气候干旱让简牍得以保存千年。20世纪初至今累计出土6万—7万枚简牍,跨越秦、汉、魏晋等时期,出土地涵盖烽燧、驿置、墓葬,是研究秦汉西北边疆与丝路史的核心一手材料。甘肃简牍博物馆是核心馆藏地,藏品5万余件(组),其中简牍近4万枚,包括敦煌悬泉汉简、肩水金关汉简、居延新简、敦煌马圈湾汉简、地湾汉简、天水放马滩秦简等。

一 主要简牍群

天水放马滩秦简:放马滩,又名牧马滩,位于天水市东南70公里的秦岭深山之中。现属天水市麦积区党川乡管辖。198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放马滩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共发掘出460枚竹简,包括《志怪故事》7枚、《日书》甲种73枚、《日书》乙种380枚。《志怪故事》类似于志怪小说《搜神记》,但年代早了500年,对研究这类文学形式的起源有重要价值。

居延新简:主要包括1972年—1974年在甲渠候官遗址和甲渠塞第四隧两个地点出土的汉简,共8000余枚。居延新简是第一次科学发掘的产物,简牍形制品类齐全,内容十分丰富,尤其是出土了基本完整的册书70余个,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纪年简最早为西汉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前后跨越近200年之久,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文化和政治社会最重要的材料。

肩水金关汉简:1973年出土于甘肃金塔境内的汉代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简牍约11000枚。肩水金关汉简就其形制而言,包括简、牍、觚、两行、签、揭、削衣等;就内容而言,主要是对边塞地区军事驻防和戍卒生活的具体记录,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肩水金关汉简是又一批地下文献的大宗出土,对研究汉代西北边防、军队体制、民族关系以及日常生活具有重大研究价值。

地湾汉简:1986年出土于甘肃金塔地湾遗址。整理编号者700余枚。最早的纪年简为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最晚为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

27年)。内容主要为肩水候官的屯戍记录和往来公文,为研究汉代张掖、居延一线的边塞防务增添了新资料。

敦煌马圈湾汉简:1979年出土于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共出土1217枚,大多为木简,竹简只有16枚。形制有简、牍、符、觚、签、封检、削衣等。内容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簿册、书牍、医药、封检、揭等。纪年简63枚。其中西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一觚,时间最早。在早期灰区中,最早的纪年简为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最晚为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其中宣、元、成、哀帝各代都有,而以平帝至王莽时期居多,占一半以上。这批简牍中,出入玉门关的资料为探索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提供了新证据;有100余枚王莽时期进军西域的奏记抄件,是研究新莽与西域关系的重要资料;还有若干关于玉门关候屯戍活动的记载,是研究边塞防御的第一手资料。

甘谷汉简:1971年12月出土于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共23枚,松木。原简为一册书,两道编绳,因编绳已朽,仅留空白处。正面抄录正文,墨书隶体,文字两行。简背顶端有“第一”至“第二十三”的编号。中间缺第四、第八、第十三、第十九这4枚简,其中伴出碎简当为此4简的残断部分。简文内容为东汉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宗正刘矩为宗室上书皇帝的奏书,而后又以诏书形式于次年颁行天下,要全国一体遵行。甘谷汉简虽多残缺,但首尾基本完整。主要反映东汉末年顺、桓帝之际宗室贵族和地方豪强官吏之间的矛盾。



肩水金关汉简

二 重要成册简牍与文物

天水放马滩秦简

1986年出土于天水放马滩遗址M1,从内容和简牍形制来说,分为甲种《日书》和乙种《日书》,还包括由7枚简牍组成的《志怪故事》。

(一)甲种《日书》

共73枚,出土时卷在最中,除个别残缺者外,其余简长27.5厘米,宽0.7厘米,厚0.2厘米。上中下三道编绳,上下两端各空出1厘米为天、地头。以中编为界,形成上下两栏。三编间距相等,为8.5厘米。每简右侧编绳处刻有三角形小楔口,便于从左至右编卷。从留存朽物看,纬编当是丝织品。大部分简的天地头正背面粘有深蓝色纺织品残片,推测编册后曾用纺织品装裱,此即为简本装帧的最早实例之一了。

从编册情况看,为先编后写,如有编绳处形成整齐的空白及个别字的刮削后留下的痕迹等。文字一律写在黄面,觚背面无任何字迹。竖行书写,每简写满,最多者可容43字,实际依内容需要,一般在25至40字之间。每简从上栏开始,同为一条内容,依次至本章写完;如若下栏有空余,用来书写其他篇章,其次序仍从第一简开始,至第一章写完。如遇本章最后句子写不下而又所剩不多时,为使连贯、避免分散,又紧接着倒写,即从最后一简依次推前,但必是互相邻近的简。这样造成了转行错乱的现象。但抄写者在关键的地方均用黑圆点“·”注示,不同的章节用粗横线“一”标明,为编册和阅读起了导引作用。

甲种《日书》可分为八章:《月建》《建除》《亡盗》《吉凶》《禹须臾》《人日》《生子》《禁忌》。

(二)乙种《日书》

共380枚。出土时依甲种而收卷,位外层。有残缺,大部分较完整。除残缺者外,简长23厘米,宽0.6厘米,厚0.2厘米。编简之制和书写格式与甲种相同。文字字形较小,字体结构和书风与甲种稍异,为不同抄写者所致,或有抄写时间的先后。内容比甲种多而丰富。甲种八章在乙种中均见,其中《月建》《建除》《亡盗》《吉凶》《禹须臾》《人日》《生子》七章都相同,唯《禁忌》条目互异。

乙种《日书》的内容较之甲种,不但篇章多,而且内容更为丰富和复杂。其中有完整的篇章,也有



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日书》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不完整者,有独立成篇者,也有互为联系者,有整篇,也有抄抄部分段落者。如《五行相生及三合局》《六甲孤虚》《五音占》《六十甲子表》《占候》《星度》《纳音五行》《律书》《音律贞卜》《问病》等篇,为研究战国时期的文化面貌、文化史、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史料。

《志怪故事》简7枚,出土时附着在乙种《日书》外层,是否与之同册编连,难以确定。全文现存260余字,内容似不能连贯,当有残缺缺失。

康居王使者册

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木质简牍7枚,桧柳。前简后牍,简牍混编,两道细麻绳编联,册书形制保存完整。内容是康居等国使者来汉朝贡,所献骆驼被酒泉太守评估不实而上诉朝廷,而朝廷则由使主客大夫下文敦煌太守,敦煌太守又下文效谷县,效谷县下文悬泉置,要求将当时情况如实上报。康居是中亚大国,一般不属西域都护直接管辖。该册书的出土,为研究西汉王朝与康居等国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元康五年悬泉置过长罗侯费用簿

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木简18枚,每简长23厘米,宽0.8厘米。内容为元康五年长罗侯常惠出使乌孙时,悬泉置招待其路过军吏的费用记录。该册书的出土,不仅为研究悬泉置的功能和经费物品的收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更重要的是为研究西汉王朝与西域关系,尤其是同乌孙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可补传世史籍之阙载。

王骏幕府档案

1979年出土于敦煌马圈湾遗址,共100余枚。这是新莽时期征伐西域叛乱诸国的奏记抄件,也是研究新莽与西域关系的重要资料。

候粟君所责寇恩册

1974年8月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第22号房址内。木质简牍36枚。全文1526字,其中6字漫灭不清,重文符3个。内容是东汉建武初年甲渠候官粟君和客民寇恩之间发生的一宗经济纠纷案的案卷材料。文件题签“建武三年十二月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包括四部分:一是建武三年十二月癸丑朔乙卯(初三日),都乡啬夫官根据居延县转来甲渠候官

的文书,对被告寇恩进行传讯的口供笔录;即“乙卯爰书”;二是十二月戊辰(十六日)的另一份爰书,除日期不同外,其他内容与前大致相同;三是十二月辛未(十九日)都乡啬夫就此案验问情况给县廷的报告;四是十二月己卯(二十七日)居延县廷对此案的判词。寇恩册是一份完整的司法文书,内容涉及军事、民政、法律、经济等各方面内容,是研究东汉初年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

塞上烽火品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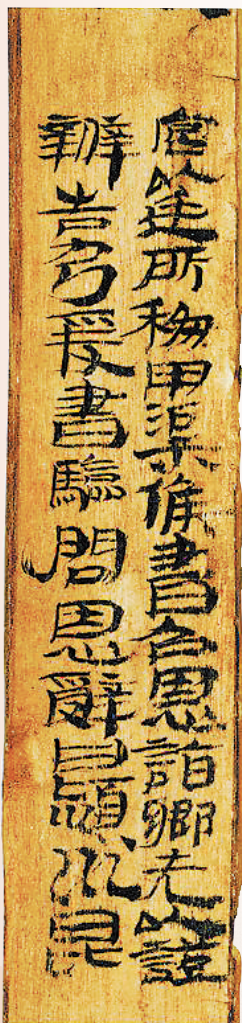
1974年8月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第16号房址内。共17枚,松木。每简文字前有一墨点,作为每条品约的起始处。每简容字多者50字,少者如最后一简品约只7个字,总共有610多字。内容主要是居延地区殄北塞、卅井塞、甲渠塞遇到匈奴来犯时,根据不同情况发出不同的警报信号的规定。虽然肩水都尉、敦煌玉门都尉和中部都尉的烽火品约也有一些零星发现,但像居延这样完整、系统的烽火品约还是第一次发现,它对研究汉代边塞地区的烽火报警系统和防御设施具有重要价值。

相利善剑剑册

1974年出土于破城子甲渠候官遗址。共6简,木质,每简一行。原有编绳三道,编绳处右侧有楔口,编绳已朽毁不存。六简容字210个。规整隶书,墨色如新。内容主要是辨识宝剑的标准和方法,提出鉴定善剑四条标准、鉴定剑六条标准以及辨识善剑剑纹饰的四条标准。《汉书·艺文志》有《相宝剑刀》二十卷,此册的出土或为《相宝剑刀》的内容,对研究汉代的金属冶炼和兵器制造具有重要意义。

隧长焦永死驹劾状

1974年出土于甲渠候官遗址第22号房址内。共16简,木质。除一枚略有残缺外,其余各简均清晰如初。全篇草书,一气呵成,潇洒飘逸,既是一篇重要文献,又是一幅书法珍品。可释读者409字。文义连贯,内容完整。第一枚为题签,第二简以下为正文,简背有书吏之签署。内容是一份追查死驹责任的文书。该册书具体生动,宛然一幅戍边士卒夜巡行图。册书内容对研究汉代的马政、边塞行轍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都有重要价值。简文书法,是研究汉代章草的典范之作。



居延汉简《候粟君所责寇恩册》